

“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赵华安 张春富（曾用名张春福）二人均为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赵华安，1953年生，1970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淀区市政园林局工作。张春富，1952年生，1971年在延川县永平镇政府参加工作，2012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是和习近平同一批到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知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当年知青下乡的情况。

赵华安：知青下乡是毛主席当时一个战略部署。“文革”时期，很多单位都无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城市青年学生的状况是，毕业生特别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插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了。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河。当时习近平、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杨京生被分到二队，他们这个队是“后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队”。当时梁家河村子很小，总共就两个生产队。

张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多好处：我们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新鲜事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念念不忘，经常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乡对我们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农村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

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京。那是一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头。火车上的知青很多，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军用卡车往延安去。卡车路上开得很慢，时速也就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况不好，车斗里坐了很多。到了延安，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川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梁家河来了差不多二十个人，帮助我们背行李，领我们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活，你们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大，一开始确实很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66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蛇之

类的东西。我被蝎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老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次上火，嗓子又红又肿，都说不出话来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熟的鸡蛋在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近平晚上去挑水，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在窑洞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们住的窑洞里面有时候会进来蛇，这是因为当时的窑洞都是土窑，冬暖夏凉，蛇就喜欢往里钻。我记得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房东的孩子王新平来叫我们：“你们赶紧来帮个忙，我们家进来一条蛇，就在我们炕上呢！”我跑上去一看，好长的一条蛇，有一米五长，还是一条红色的花蛇，正在他家炕上盘着，蛇头伸在外面，吐着信子，十分吓人。王新平的家人都吓得躲在了灶台后面。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赶紧拿了一条被子给蛇给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来吓人。王新平的家人说这东西有灵性，不要打死它，还是把

它放走吧。我就冒着大雨拎着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个沟里头。经过这一件事情，老乡和我们的感情更亲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当成自己家人，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吃不上什么东西，他们平时有什么吃食都会叫我去。王新平现在还和我们保持联系，仍然像一家人一样来往。他来北京玩，我都是请他住在家里。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在梁家河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吧。

张春富：我们刚开始吃农村食物，真的很不习惯。当地人用糠做的糠团子，黑哩吧唧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挺新鲜，就想尝一尝，结果吃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吃了。这糠团子非常干，难以下咽，噎得人吃不下去。当时，国家给我们知青有专门的供应粮，我们比老乡吃的稍微强一点。

赵华安：在农村插队，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都要自己料理生活，像缝补衣服，之前都没干过的活儿，现在都要自己干了。衣服破了，我们都不怎么会缝，就学着缝，穿针引线，补得歪歪扭扭，也不在乎好不好看，补上窟窿就行了。我见过近平有一次缝自己的一件衣服，针脚挺长，不过好歹缝得还挺整齐。

后来，很多知青离开了梁家河，村里就把前队、后队的知青合在一起，都住在一排知青窑里。文安驿有集市，我记得是十天有三个集。近平去赶集的时候，从我们窑洞门口路过，就给我们打招呼，问问谁愿意一起去，就结伴同行。近平不是那种话很多的人，他性格随和，对人友善，喜欢交朋友。通过接触，我们也发现他这个人格格直率，说话直截了当，讲什么事情很清晰、很明确，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们一般去文安驿买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还有像信封、信纸一类的文具。买煤油也得去文安驿，不过要凭票购买，最多只能买半斤。因为每次去文安驿买东西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临时需要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方便。这也是近平后来在梁家河搞代销点的原因之一。有了代销点，大家买东西就方便多了。

张春富：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学习情况。

张春富：插队期间，农村经常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学习，通常一两天就要学习一次。我们知青都在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文安驿开会。去文安驿开会的时候，都得早起，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并且那个时候开会可不像现在有会场、有座位，大家都在公社大院里面，都是站着听，通常都要站一两个小时。

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间窑洞里面，点着马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那时候，我们学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赵华安：在窑洞里的时，近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下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很喜欢看手，喜欢思考，喜欢写东西。他带来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权威

——重读恩格斯《论权威》

编者按：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党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任务。

□董洁

恩格斯于1872年10月写就的《论权威》，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日益兴起迫切需要权威，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权威的大背景下写就的。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权威的定义、权威存在的客观性以及维护权威的重要性等提出了十分深刻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写作背景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尤其迅速，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萌芽。与之相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凸显，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私人化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些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从1825年开始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危机爆发使得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起来斗争的运动随之兴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时代。恩格斯的《论权威》就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阶级矛盾趋于尖锐的大背景下写就的。

从写作的直接动因看，恩格斯写作这篇短文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

宣传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任何权威，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恶劣影响，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无产阶级运动也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巴枯宁，利用巴黎公社失败、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加紧对第一国际迫害的机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中央执行机关。1872年9月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错误，并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但巴枯宁没有善罢甘休，纠集追随者召开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权威主义大会，拼凑起“反权威主义”国际。为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性、反革命性，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恩格斯在多次与马克思通信后，写出了《论权威》，提出了自己的权威观，从理论上对权威的本质与重要性进行了深刻分析。

主要观点

关于权威的定义。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很显然，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权威的规定性，权威不受个人意志支配，且以服从为前提。这说明了权威具有强制性和服从性。从根本上看，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约束个人自由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权威要求人们听从支配，不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一个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作业；一个战士，必须无条件执行来自

上级的命令，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军法惩治。同样，一名公民，也要积极遵守社会公德、公民道德，不得违反法律。

关于权威存在的客观性。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威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没有权威，活动就组织不起来，越是复杂的联合性活动越需要权威。正如恩格斯所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恩格斯还用铁路、航行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委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还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了权威的客观存在性。这不是一种乘客对铁路管理者、客人对船长的简单委托关系，而是处在一定社会阶段的人和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本质规定性。当然，列车长、船长个人的意志或权威是以其背后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规程为基础的，绝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意志，个人的意志或权威仅仅是执行制度或规程的表象。

关于权威的好坏。恩格斯认为，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

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而改变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权威是个好东西。至少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实践表明，没有权威的社会容易陷入无序，没有权威社会组织将不成其为组织。

关于权威的消亡。恩格斯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很明显，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劳动只是为了更加快乐的情况下，权威才会消失。因此他批评反权威主义者，指出他们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和未来走向消失的社会基础，而且对那些无端反对权威、蔑视历史阶段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现实性抨击。

关于维护权威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思巴黎公社失败的基础上提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哪怕支持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的太少了吗？这实际上说明了维护权威、运用权威在革命年代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启示

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样化变革势不可挡，同时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守成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色彩愈加突出、新兴大国面临成长的烦恼，如何给地球村村民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成为摆在全球各国领导人面前的紧



迫课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次展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助推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党的事业出现新气象。当代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一句话，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领袖的权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也都曾特别强调权威的重要性。当下，我们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

重读
經典